

读史阅世

说史谈屑

1773年波士顿倾茶事件中福建茶的品类与价值

□江振鹏

1773年发生于英属北美波士顿的倾茶事件是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专制统治、推动北美走向独立的序曲,新英格兰其他城市纷纷仿效并支持波士顿人民的抗英斗争,这在实质上肢解了英国经营的跨大西洋帝国,推动建立美利坚合众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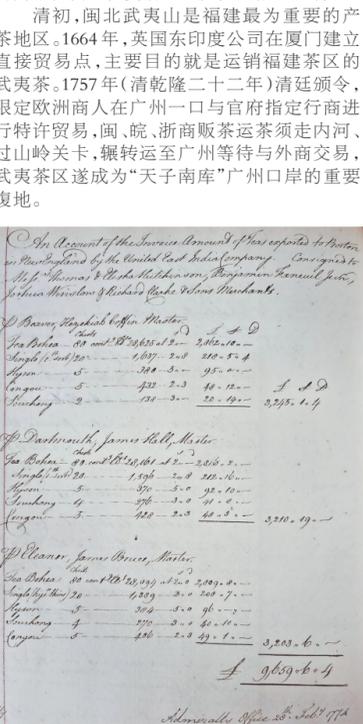
针对波士顿倾茶事件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被倾倒入波士顿湾的中国茶叶从哪里来?畅销北美市场,引发当地“抗茶会”抵制中国茶叶有哪些品种,价值如何?以笔者目前所见,尚未有资料予以详细阐述。本文将从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布的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毁茶叶清单入手,探讨18世纪70年代畅销北美的福建茶类及其价值,从而对18世纪中国(福建)茶叶全球化的产销联系网络有更深理解。

武夷茶“通天下”

作为亚热带季风区山地经济的重要物产,中国茶拥有悠久的种植、制作、消费历史,长期以来产自中国的茶叶是国际市场上唯一来源。福建是中国重要茶区,宋元两朝至明前期茶业颇为发达,“一年号供闽,天产社瓯闽”,闽北建茶相当长时间内都是贡茶的重要来源。

明中叶之后,闽茶输出与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开辟的全球商业网络对接,推动了福建茶叶外销迈向兴盛。根据陈椽《茶业通史》考证,1660年,英国人将荷兰人转译的“Thee”(拉丁文,来自厦门方言“tai”,茶字之闽南语音)拼成“Tea”(起初发音为Tay),足见语言文化随着商品物质文化交流已经在发生相互影响。

清初,闽北武夷山是福建最为重要的产茶地区。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建立直接贸易点,主要目的就是运销福建茶区的武夷茶。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颁令,限定欧洲商人在广州一口与官府指定行商进行特许贸易,闽、皖、浙商贩茶运茶须走内河、过山岭关卡,辗转运至广州等待与外商交易,武夷茶区遂成为“天子南库”广州口岸的重要腹地。



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毁茶叶清单(来源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官网)

史海钩沉

茶农、茶商、政府：民国福州茶市的博弈

□黄金宏

清末由于西方对武夷山红茶的渴求,福州成为世界级的茶港。民国时期,福州港虽不复往昔,但福州南台依然遍布大量的茶行。通过3份民国档案,可以窥见福州茶市中茶农、茶商和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

当时整个茶叶产业链为茶农—茶帮—茶行—洋行。茶帮是经营茶叶的中间商,其本质是脚夫组织,一般是到产地收购运输茶叶,贩卖给茶行。茶行(或茶栈、茶号)亦是经营茶叶的中间商,从事茶叶收购、加工、销售和贸易。茶行把收购到的毛茶进行加工,如杀青、揉捻、发酵、干燥等制成茶销售或贸易。茶行掌握了产业链中重要的环节——制茶工艺和销售渠道。在这条产业链中,茶农受制于茶帮,茶帮受制于茶行,茶行受制于洋行,致使成本高涨、品质欠佳,华茶声誉低落,行业凋敝。茶农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被层层剥削所剩无几,且他们势单力薄,无力与茶帮和茶行相抗衡。

20世纪30年代后期借助抗战时期的统制经济,政府势力开始介入茶农与茶商(茶帮、茶行)的博弈,各县区成立了茶叶生产合作社,形成茶农组织。档案《福建省政府(社会处)对福安绥循纲呈诉受福州茶栈垄断市场剥削茶农给福州市政府的训令》(1947年)讲述的是福安县的茶农组织“茶叶生产合作社联合社”的经理缪循纲,向省政府控诉福州恒远公帮、义德堂与安利茶栈勾结垄断经营,收

尽管路途遥远、航路艰辛,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只依然往来于亚洲各港口,运销中国红茶和绿茶,其背后驱动力是长期垄断茶叶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西人消费茶叶的巨大需求使得武夷茶区不断扩展,茶事季节崇安成为南方茶叶集散中心,洪亮吉在《更生斋集》中有“采茶十万人,担茶十多万”之句。武夷茶海外运销繁忙,清人蒋衡目睹武夷“茶市闹如云”,有“逾海通蛮徼,直北走榆关”之比喻。

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本土的伦敦、格拉斯哥、利物浦等城市及其北美殖民地来自东方茶叶的消费已经比较流行,不过其价格相对昂贵。

清单上的福建茶

1773年,英国议会制定法律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北美茶叶贸易垄断权。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伦敦租用了4艘自北美运油返程的船只,以运输从中国采购的茶叶,企图前往波士顿销售。这批茶叶在伦敦出港时免税,但到殖民地销售时却要向消费者收取每磅3便士的茶税。

这引发新英格兰商人的强烈不满,当地组织各种“抗茶会”。伦敦运来的茶叶于12月16日晚被倾倒入海中。根据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波士顿“抗茶会”销毁茶叶的发票清单,3艘船只分别是“贝佛号”(Ship Beaver)、“达特茅斯号”(Ship Dartmouth)和“埃内林号”(Ship Eleanor)。“贝佛号”被毁茶叶清单记载如下:武夷茶(Bohea Tea)计80箱,松萝茶(Sunglo,一等品)20箱,熙春茶(Hyson)5箱,工夫茶(Congou)5箱和小种茶(Souchong)2箱;“达特茅斯号”装载的茶叶列如下:武夷茶计80箱,松萝茶(一等品)20箱,熙春茶5箱,工夫茶5箱和小种茶4箱;最后一艘“埃内林号”装载的茶叶则包括武夷茶80箱,松萝茶(一等皮茶)20箱,熙春茶5箱、工夫茶5箱和小种茶4箱。

从3艘运茶船的货物清单可以统计出基本的中国茶类:来自福建茶区的武夷茶240箱,工夫茶15箱,小种茶10箱,合计265箱,以上3种都是来自福建建宁府武夷山茶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红茶品类。至今保存于武夷山云窝景区的禁茶碑(刻于1763年)上就铸有“松制”“小种”两种茶叶。清雍正年间,崇安知县刘靖在《片刻闲集》(卷一)明确指出当时的武夷茶高下分为两种,两种之中又各分高下数种,前者是岩茶,后者为洲茶,“岩茶中最高者曰老树小种,次则小种,次则小种工夫,次则工夫花香,次则花香”。这是中国红茶产地记载下来的茶叶分类参考系统。

毁茶的品类及价值

福建茶叶的分类形态也影响到了欧洲茶商,尤其是东印度公司向消费者分销茶叶时,这种分类系统就成为定价的重要参考。18世纪欧洲商人来华采购的茶叶,红茶皆称为“武夷”(英文为Bohea,实际上海门方言读“武夷”二字原为Vu-i,Bohea应为欧洲人讹传之结果),该茶类传统上来自武夷山区,但茶商们用“武夷”茶实际指代所有的中国红茶。

另据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部职员写成的《茶商采购指南》(The Tea Purchasers' Guide, 1785年)中对茶叶的知识分类,武夷茶当时被视为最为低档的红茶,《指南》记载武夷茶时还

提起再诉愿的训令、决定书》(1941年)记载了中央行政院经济部决议:驳回理由为“何同泰茶行用秤加重十六两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其有无变造行为,均不得以此作为避免补偿的理由。省府决议移送司法机关审理亦无不当”。

官秤是否有意变造,现已无从查证。笔者从双方数次交锋的言辞笔墨考察,何同泰茶行是福州大茶商,势力强大,对县府的谄词谄辞犀利、逻辑严密,指责其意欲中饱私囊“借茶农之名义而为人己之账本”,并以行政机关无量刑权责试图推翻县府决议。对省府的谄词虽言辞缓和,但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接到省府决议,十一月即向中央行政院再次提起诉愿,可见其态度之坚决强硬。

从县府、省府、中央行政院三级政府的决议看,表面上上级政府均维护了下级政府,但省府决议已做了让步。中央行政院驳回何同泰茶行的诉愿后,是否将其移送司法机关按伪造度量衡罪刑?已无档案直接证明,但笔者推论是没有,因另一份文件显示此后成立了政府组织的东南茶区场厂联合会福建分会,何同泰的创始人何培阁积极参与筹备并担任常务委员。由此可见,此次大茶商和政府的博弈中,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何同泰茶行赔偿茶农损失,政府撤销伪造度量衡罪的刑罚。

茶农、茶商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政府的介入增加了茶农的集体力量,可以与茶商谈判争取自身利益。茶商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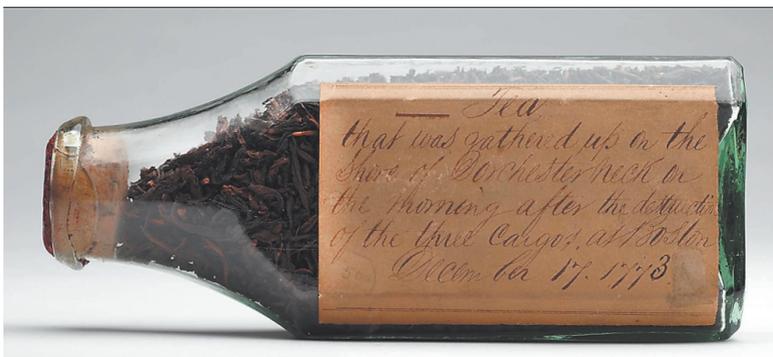
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市场策略,试图在政府的管辖下找到自身最大的利益空间。在双方的博弈和妥协中,政府力量在茶市中愈发凸显。

从时代背景考察,1939年至1941年属于抗日战争时期,政府财政吃紧,茶叶属于重要的战略物资。政府力量介入茶市打压茶商,符合统制经济的需求。此外,政府成立了茶叶管理局和省贸易公司统购统销茶叶,强势控制茶叶的生产和销售,重塑了茶叶产业链。抗战结束后,统制经济不再执行,但政府已成为茶市的主导力量。

从整个行业考察,福州的茶农、茶商均受洋行高利盘剥。究其原因,在生产方面大部分茶行仍维持上千年的手工制作,技术落后;在运输方面,仍维持百年以来受洋行把持的局面,各个茶行资本少、技术弱,一盘散沙,均不足以抗衡洋行,只有政府介入才能改变局面。1940年成立了国营福建茶叶示范厂,规模宏大,开办资金达80多万元,成为全国最大的集产、学、研、推广、销售为一体的现代茶叶工厂。

总的来看,茶农、茶商和政府茶叶产业链中各自扮演重要的角色,彼此之间的博弈构成了茶叶市场的动态平衡。抗日战争以后,政府逐渐成为茶叶市场的主导,深刻影响了茶叶市场的运行规则。可惜的是,民国时期战乱连连,政治腐败,政府力量进入茶市后亦不能挽救福州茶业之凋敝。

(作者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捞回的“武夷茶”(现藏于马萨诸塞州历史协会)

少校跟随由波士顿港改装的“中国皇后号”从纽约出发,经过半年多时间抵达广州,这艘商船载达368吨的货物装有人参、木材、白银等货物,山茂召担任大班也就是货物协调员。这艘满载美利坚人贸易希望的船只在历经1.3万英里航程后驶入广州港,交换茶叶、瓷器等中国货物,由此开启美国与中国太平洋航线直接贸易的先河。“中国皇后号”返回美国纽约、费城等地分销货物时卸下1000箱的中国茶叶,包括武夷茶、工夫、小种和制小种(padre Souchong)等福建红茶,也包括珠茶、熙春、松萝等绿茶,甚至武夷茶中奇珍僧制白毫也出现在货品清单上。

清代侯官人郑杰编纂的《药炉集旧》卷五中记载(武夷)山僧制作小种之珍贵,“岩不数种,种不斤许,小种之所以贵也”。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商采购指南》还列有中国武夷红茶中极为罕见的白毫(Pekoe),认为价格最昂,极为稀有,一般都不单独泡制,而是添加到其余茶类,用以提香。这与武夷山当地留下的中国茶文献记载有所区别。王复礼《随见录》有载武夷造茶以“僧家所制者”最为得法,“至洲茶中采回时,逐片择其背上有白毛者,另炒另焙,谓之白毫,又名寿眉眉”,白毫茶属于洲茶。刘靖在《片刻闲集》中也谈到“洲茶中最高者为白毫,次则紫毫,次则芽茶”。这说明武夷茶在18世纪全球茶叶贸易链条产销两地的品类和价值并非一一对应。至19世纪,白毫茶在武夷山依然被归入洲茶之类。郭柏苍的《闽产异录》谈及武夷茶时指出“莲心、白毫、紫毫、雀舌皆外山及洲茶”。早期英美商人对武夷茶类的追捧,应该已经在探索自己的分类系统与定价参考。

大部分产自福建茶区的中国红茶,经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装载抵达伦敦。这批茶叶运往波士顿后引发倾茶事件。仅仅在在英国签订《巴黎和约》6个月后,美国商船就远赴广州运销中国茶叶、瓷器等商品,武夷红茶仍然是最重要的标的。因此,来自中国福建的茶叶不在无意间因此发了美国独立革命,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茶叶贸易方式,帮助新生美利坚度过建国初期较为艰难的国际封锁阶段,成为其经济独立成长中不可忽视的一环。

闽茶元素的遗迹留存成为波士顿当地保存独立建国遗产、守护共同记忆的重要内容,深深嵌入作为“美利坚灵魂”的马萨诸塞州当地文化记忆系统中之。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

“文十番”乐器主要包括丹皮、檀板、云锣、奚琴、四弦胡、尺胡、三弦、八角琴、九弦琴、苏笛(箫),或者琵琶、三弦、笙、苏笛(箫)、横笛、老胡、二胡、轧拳(枕头琴)、锣鼓、云锣等,其主要乐器轧拳(枕头琴)乃唐代遗存的一种拉弦乐器,被誉为“民间乐器活化石”。“文十番”曲牌不多,相传有200多曲,但至上世纪50年代前,有据可查的仅《驻云飞》等25首。其曲调风格古朴优雅,独树一帜,节奏舒缓,旋律委婉,词少腔多,有“唱一句能走半个村”的形象说法。

“武十番”乐器主要包括横笛、板胡、四胡、二胡、尺胡、中胡、贡胡、三弦、八角琴、云锣等。曲牌丰富,有大牌360题、小牌720题之多,常用曲牌有《北台妆》《荔枝楼》《风和子》《上小楼》《琵琶词》《将军令》《过山虎》《楼台会》等。曲调与“莆仙戏”类似,演奏时刚劲有力、音色尖锐。

“八乐”以“十番”为基础,加进唢呐和锣(但不云锣)、鼓、钹等打击乐,有掌鼓一人,大小钹各一人,大小锣各一人,大吹二人,打击乐器之外,另配有横笛、尺胡、四胡、贡胡、三弦、八角琴等8人组成的管弦乐伴奏乐队,包括吹打、丝竹和演唱。吹打又称武乐,丝竹又称文乐,文武相生,极具情趣。“八乐”最早由少年男女奏唱,南宋莆仙人黄公度有诗曰“万户牲醴无水旱,四时歌舞走儿童”,描述的就是“八乐”少儿队演奏的情景。

“十番八乐”艺术特征可谓内涵生动、外延灵动。从内涵看,莆仙地区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赋予“十番八乐”独特气质,一些乐曲的编排和演奏技巧,生动模仿高山流水、鸟语虫鸣等天籁,文化底蕴与山水意境的交融、中原古语与莆仙方言的嬗变等因素,潜移默化融入其中。

从外延看,“十番八乐”与“莆仙戏”及相关的“伴鼓乐”“大鼓吹”“板鼓吹”等基因相连、血缘相近。“莆仙戏”的舞台艺术被誉为“集盛唐之精英,留霓裳羽衣之遗响,采宫廷教坊之萃菁,取山村田野之歌调”,具有高深邃远格局和典雅完美境界。“莆仙戏”至今犹存宋、元南戏的全部剧目,不仅有元末明初五大传奇,更有传世稀少的南戏早期作品《张协状元》《王魁》等。与之同名同调或同名异调的曲目,在“十番八乐”中大量存在,说明“十番八乐”受到南戏与“莆仙戏”影响之深。

在莆仙乡间,逢年过节常能看到由小唢呐、飘笛和小堂鼓、单皮鼓、檀板、平面大锣、小锣、二钹、小钹等打击乐器组成的“伴鼓乐”,所用乐器与“八乐”中打击乐器相同,演奏简便易行、声音洪亮。南宋莆仙诗人刘克庄有诗云“劝君莫入珠帘去,羯鼓如雷打出来”。“蛙鼓饕耕者,鸡豚赛礼公。不闻车轧轧,但见鼓咚咚”,描绘的应当即是“伴鼓乐”。

“十番八乐”与“莆仙戏”“大鼓吹”“伴鼓乐”“板鼓吹”等相关演奏方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莆仙民间节庆文化“传家宝”和民众精神生活“营养餐”,有的更适宜“阳春白雪”大雅之堂,有的更适宜“下里巴人”田间地头,大雅大俗,亦庄亦谐,不分贵贱,老少皆宜,是莆仙老百姓世代守护传承的“古老新韵”、自娱自乐的“乡音心曲”。

莆仙“十番八乐”既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又服水土、接地气、贴近民间、融入民俗。莆仙文化是中原文化、吴越文化与土著文化、海洋文化融合的结晶,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元素。据传最早起源于唐代,每逢农闲时节,工余饭后,“十番队”便聚到“十番间”,边喝茶聊天,边吹拉弹唱,休闲娱乐,增进情谊。在明清时期,莆仙“十番八乐”进入较为繁荣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乐曲编排更加丰富多样,乐器种类也得到进一步丰富完善,演奏技巧也日臻成熟。民间传说,明万历后期每年旧历三月十五日,兴化府有万人左右会聚于黄石的旧辰官、凤山官、谷城官、游神行像,进行“十番八乐”竞赛。最多时曾有170多个“十番班”在溪船上演奏,各个“十番班”轮番到官庙的菩萨殿前演奏,并登台比武。

莆仙“十番八乐”起源与发展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元素,包括南音、北曲以及其他民间音乐。古今以来,不仅在宗教祭祀、民俗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还逐渐渗透到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婚丧嫁娶、节庆活动、移风易俗等各种场合发挥独特作用。莆仙人春节过年、团圆聚会,或“十番八乐”演奏,或“莆仙戏”演出,或“大鼓吹”“伴鼓乐”“板鼓吹”助兴,左右右合奏如一家,男女老少围着篝火,暖身暖心,吹拉弹唱,讲古聊天,共享丰收喜悦、幸福时光。

过去,莆仙“十番八乐”的传承更多以口头传授和心灵沟通的方式进行,包含了技艺传授的连续性和情感传递的柔性传承。如今,一些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举办文化节庆活动,常会邀请莆仙“十番八乐”队员或爱好者、志愿者前来演奏,一些文化机构和民间组织也会举办莆仙“十番八乐”的培训、交流和比赛,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学习训练。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莆仙“十番八乐”有望通过互联网平台、数字化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更广泛的传播和推广,促进形成推陈出新、交流交融的良性循环。

乡土文化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孕育产生发展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对人文地理环境影响的精华汲取,也是丰富发展地域文化内涵的创新创造。莆仙文化较好地保留了“衣冠南渡”以来中原土族的文化教育传统,形成“地覆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优良民风,崇文重教,人才辈出。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有形的乡土文化留得住,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莆仙“十番八乐”作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古老新韵”“乡音心曲”,承载着浓厚的地域特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艺术风格。莆仙“十番八乐”是乡土的、民族的,也是国家的、世界的。有形的、活态的莆仙“十番八乐”,一定能为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助力赋能。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莆仙“十音八乐”

□宋雪霞

1773年发生于英属北美波士顿的倾茶事件是殖民地人民反抗英国专制统治、推动北美走向独立的序曲,新英格兰其他城市纷纷仿效并支持波士顿人民的抗英斗争,这在实质上肢解了英国经营的跨大西洋帝国,推动建立美利坚合众国。

针对波士顿倾茶事件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被倾倒入波士顿湾的中国茶叶从哪里来?畅销北美市场,引发当地“抗茶会”抵制中国茶叶有哪些品种,价值如何?以笔者目前所见,尚未有资料予以详细阐述。本文将从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布的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毁茶叶清单入手,探讨18世纪70年代畅销北美的福建茶类及其价值,从而对18世纪中国(福建)茶叶全球化的产销联系网络有更深理解。

作为亚热带季风区山地经济的重要物产,中国茶拥有悠久的种植、制作、消费历史,长期以来产自中国的茶叶是国际市场上唯一来源。福建是中国重要茶区,宋元两朝至明前期茶业颇为发达,“一年号供闽,天产社瓯闽”,闽北建茶相当长时间内都是贡茶的重要来源。

明中叶之后,闽茶输出与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开辟的全球商业网络对接,推动了福建茶叶外销迈向兴盛。根据陈椽《茶业通史》考证,1660年,英国人将荷兰人转译的“Thee”(拉丁文,来自厦门方言“tai”,茶字之闽南语音)拼成“Tea”(起初发音为Tay),足见语言文化随着商品物质文化交流已经在发生相互影响。

清初,闽北武夷山是福建最为重要的产茶地区。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厦门建立直接贸易点,主要目的就是运销福建茶区的武夷茶。1757年(清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颁令,限定欧洲商人在广州一口与官府指定行商进行特许贸易,闽、皖、浙商贩茶运茶须走内河、过山岭关卡,辗转运至广州等待与外商交易,武夷茶区遂成为“天子南库”广州口岸的重要腹地。

尽管路途遥远、航路艰辛,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只依然往来于亚洲各港口,运销中国红茶和绿茶,其背后驱动力是长期垄断茶叶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西人消费茶叶的巨大需求使得武夷茶区不断扩展,茶事季节崇安成为南方茶叶集散中心,洪亮吉在《更生斋集》中有“采茶十万人,担茶十多万”之句。武夷茶海外运销繁忙,清人蒋衡目睹武夷“茶市闹如云”,有“逾海通蛮徼,直北走榆关”之比喻。

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本土的伦敦、格拉斯哥、利物浦等城市及其北美殖民地来自东方茶叶的消费已经比较流行,不过其价格相对昂贵。

这引发新英格兰商人的强烈不满,当地组织各种“抗茶会”。伦敦运来的茶叶于12月16日晚被倾倒入海中。根据177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波士顿“抗茶会”销毁茶叶的发票清单,3艘船只分别是“贝佛号”(Ship Beaver)、“达特茅斯号”(Ship Dartmouth)和“埃内林号”(Ship Eleanor)。“贝佛号”被毁茶叶清单记载如下:武夷茶(Bohea Tea)计80箱,松萝茶(Sunglo,一等品)20箱,熙春茶(Hyson)5箱,工夫茶(Congou)5箱和小种茶(Souchong)2箱;“达特茅斯号”装载的茶叶列如下:武夷茶计80箱,松萝茶(一等品)20箱,熙春茶5箱,工夫茶5箱和小种茶4箱;最后一艘“埃内林号”装载的茶叶则包括武夷茶80箱,松萝茶(一等皮茶)20箱,熙春茶5箱、工夫茶5箱和小种茶4箱。

从3艘运茶船的货物清单可以统计出基本的中国茶类:来自福建茶区的武夷茶240箱,工夫茶15箱,小种茶10箱,合计265箱,以上3种都是来自福建建宁府武夷山茶区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红茶品类。至今保存于武夷山云窝景区的禁茶碑(刻于1763年)上就铸有“松制”“小种”两种茶叶。清雍正年间,崇安知县刘靖在《片刻闲集》(卷一)明确指出当时的武夷茶高下分为两种,两种之中又各分高下数种,前者是岩茶,后者为洲茶,“岩茶中最高者曰老树小种,次则小种,次则小种工夫,次则工夫花香,次则花香”。这是中国红茶产地记载下来的茶叶分类参考系统。

福建茶叶的分类形态也影响到了欧洲茶商,尤其是东印度公司向消费者分销茶叶时,这种分类系统就成为定价的重要参考。18世纪欧洲商人来华采购的茶叶,红茶皆称为“武夷”(英文为Bohea,实际上海门方言读“武夷”二字原为Vu-i,Bohea应为欧洲人讹传之结果),该茶类传统上来自武夷山区,但茶商们用“武夷”茶实际指代所有的中国红茶。

另据英国东印度公司茶叶部职员写成的《茶商采购指南》(The Tea Purchasers' Guide, 1785年)中对茶叶的知识分类,武夷茶当时被视为最为低档的红茶,《指南》记载武夷茶时还

提起再诉愿的训令、决定书》(1941年)记载了中央行政院经济部决议:驳回理由为“何同泰茶行用秤加重十六两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其有无变造行为,均不得以此作为避免补偿的理由。省府决议移送司法机关审理亦无不当”。

官秤是否有意变造,现已无从查证。笔者从双方数次交锋的言辞笔墨考察,何同泰茶行是福州大茶商,势力强大,对县府的谄词谄辞犀利、逻辑严密,指责其意欲中饱私囊“借茶农之名义而为人己之账本”,并以行政机关无量刑权责试图推翻县府决议。对省府的谄词虽言辞缓和,但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接到省府决议,十一月即向中央行政院再次提起诉愿,可见其态度之坚决强硬。

从县府、省府、中央行政院三级政府的决议看,表面上上级政府均维护了下级政府,但省府决议已做了让步。中央行政院驳回何同泰茶行的诉愿后,是否将其移送司法机关按伪造度量衡罪刑?已无档案直接证明,但笔者推论是没有,因另一份文件显示此后成立了政府组织的东南茶区场厂联合会福建分会,何同泰的创始人何培阁积极参与筹备并担任常务委员。由此可见,此次大茶商和政府的博弈中,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何同泰茶行赔偿茶农损失,政府撤销伪造度量衡罪的刑罚。

茶农、茶商和政府之间的博弈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政府的介入增加了茶农的集体力量,可以与茶商谈判争取自身利益。茶商也

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市场策略,试图在政府的管辖下找到自身最大的利益空间。在双方的博弈和妥协中,政府力量在茶市中愈发凸显。

从时代背景考察,1939年至1941年属于抗日战争时期,政府财政吃紧,茶叶属于重要的战略物资。政府力量介入茶市打压茶商,符合统制经济的需求。此外,政府成立了茶叶管理局和省贸易公司统购统销茶叶,强势控制茶叶的生产和销售,重塑了茶叶产业链。抗战结束后,统制经济不再执行,但政府已成为茶市的主导力量。

从整个行业考察,福州的茶农、茶商均受洋行高利盘剥。究其原因,在生产方面大部分茶行仍维持上千年的手工制作,技术落后;在运输方面,仍维持百年以来受洋行把持的局面,各个茶行资本少、技术弱,一盘散沙,均不足以抗衡洋行,只有政府介入才能改变局面。1940年成立了国营福建茶叶示范厂,规模宏大,开办资金达80多万元,成为全国最大的集产、学、研、推广、销售为一体的现代茶叶工厂。

总的来看,茶农、茶商和政府茶叶产业链中各自扮演重要的角色,彼此之间的博弈构成了茶叶市场的动态平衡。抗日战争以后,政府逐渐成为茶叶市场的主导,深刻影响了茶叶市场的运行规则。可惜的是,民国时期战乱连连,政治腐败,政府力量进入茶市后亦不能挽救福州茶业之凋敝。

(作者单位:福建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十番”乐器主要包括丹皮、檀板、云锣、奚琴、四弦胡、尺胡、三弦、八角琴、九弦琴、苏笛(箫),或者琵琶、三弦、笙、苏笛(箫)、横笛、老胡、二胡、轧拳(枕头琴)、锣鼓、云锣等,其主要乐器轧拳(枕头琴)乃唐代遗存的一种拉弦乐器,被誉为“民间乐器活化石”。“文十番”曲牌不多,相传有200多曲,但至上世纪50年代前,有据可查的仅《驻云飞》等25首。其曲调风格古朴优雅,独树一帜,节奏舒缓,旋律委婉,词少腔多,有“唱一句能走半个村”的形象说法。

“武十番”乐器主要包括横笛、板胡、四胡、二胡、尺胡、中胡、贡胡、三弦、八角琴、云锣等。曲牌丰富,有大牌360题、小牌720题之多,常用曲牌有《北台妆》《荔枝楼》《风和子》《上小楼》《琵琶词》《将军令》《过山虎》《楼台会》等。曲调与“莆仙戏”类似,演奏时刚劲有力、音色尖锐。

“八乐”以“十番”为基础,加进唢呐和锣(但不云锣)、鼓、钹等打击乐,有掌鼓一人,大小钹各一人,大小锣各一人,大吹二人,打击乐器之外,另配有横笛、尺胡、四胡、贡胡、三弦、八角琴等8人组成的管弦乐伴奏乐队,包括吹打、丝竹和演唱。吹打又称武乐,丝竹又称文乐,文武相生,极具情趣。“八乐”最早由少年男女奏唱,南宋莆仙人黄公度有诗曰“万户牲醴无水旱,四时歌舞走儿童”,描述的就是“八乐”少儿队演奏的情景。

“十番八乐”艺术特征可谓内涵生动、外延灵动。从内涵看,莆仙地区的历史人文地理环境赋予“十番八乐”独特气质,一些乐曲的编排和演奏技巧,生动模仿高山流水、鸟语虫鸣等天籁,文化底蕴与山水意境的交融、中原古语与莆仙方言的嬗变等因素,潜移默化融入其中。

从外延看,“十番八乐”与“莆仙戏”及相关的“伴鼓乐”“大鼓吹”“板鼓吹”等基因相连、血缘相近。“莆仙戏”的舞台艺术被誉为“集盛唐之精英,留霓裳羽衣之遗响,采宫廷教坊之萃菁,取山村田野之歌调”,具有高深邃远格局和典雅完美境界。“莆仙戏”至今犹存宋、元南戏的全部剧目,不仅有元末明初五大传奇,更有传世稀少的南戏早期作品《张协状元》《王魁》等。与之同名同调或同名异调的曲目,在“十番八乐”中大量存在,说明“十番八乐”受到南戏与“莆仙戏”影响之深。

在莆仙乡间,逢年过节常能看到由小唢呐、飘笛和小堂鼓、单皮鼓、檀板、平面大锣、小锣、二钹、小钹等打击乐器组成的“伴鼓乐”,所用乐器与“八乐”中打击乐器相同,演奏简便易行、声音洪亮。南宋莆仙诗人刘克庄有诗云“劝君莫入珠帘去,羯鼓如雷打出来”。“蛙鼓饕耕者,鸡豚赛礼公。不闻车轧轧,但见鼓咚咚”,描绘的应当即是“伴鼓乐”。

“十番八乐”与“莆仙戏”“大鼓吹”“伴鼓乐”“板鼓吹”等相关演奏方式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构成莆仙民间节庆文化“传家宝”和民众精神生活“营养餐”,有的更适宜“阳春白雪”大雅之堂,有的更适宜“下里巴人”田间地头,大雅大俗,亦庄亦谐,不分贵贱,老少皆宜,是莆仙老百姓世代守护传承的“古老新韵”、自娱自乐的“乡音心曲”。

莆仙“十番八乐”既底蕴深厚、源远流长,又服水土、接地气、贴近民间、融入民俗。莆仙文化是中原文化、吴越文化与土著文化、海洋文化融合的结晶,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的文化元素。据传最早起源于唐代,每逢农闲时节,工余饭后,“十番队”便聚到“十番间”,边喝茶聊天,边吹拉弹唱,休闲娱乐,增进情谊。在明清时期,莆仙“十番八乐”进入较为繁荣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乐曲编排更加丰富多样,乐器种类也得到进一步丰富完善,演奏技巧也日臻成熟。民间传说,明万历后期每年旧历三月十五日,兴化府有万人左右会聚于黄石的旧辰官、凤山官、谷城官、游神行像,进行“十番八乐”竞赛。最多时曾有170多个“十番班”在溪船上演奏,各个“十番班”轮番到官庙的菩萨殿前演奏,并登台比武。

莆仙“十番八乐”起源与发展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在形成过程中吸收了大量外来文化元素,包括南音、北曲以及其他民间音乐。古今以来,不仅在宗教祭祀、民俗仪式中扮演重要角色,还逐渐渗透到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婚丧嫁娶、节庆活动、移风易俗等各种场合发挥独特作用。莆仙人春节过年、团圆聚会,或“十番八乐”演奏,或“莆仙戏”演出,或“大鼓吹”“伴鼓乐”“板鼓吹”助兴,左右右合奏如一家,男女老少围着篝火,暖身暖心,吹拉弹唱,讲古聊天,共享丰收喜悦、幸福时光。

过去,莆仙“十番八乐”的传承更多以口头传授和心灵沟通的方式进行,包含了技艺传授的连续性和情感传递的柔性传承。如今,一些政府部门或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举办文化节庆活动,常会邀请莆仙“十番八乐”队员或爱好者、志愿者前来演奏,一些文化机构和民间组织也会举办莆仙“十番八乐”的培训、交流和比赛,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学习训练。随着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莆仙“十番八乐”有望通过互联网平台、数字化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更广泛的传播和推广,促进形成推陈出新、交流交融的良性循环。

乡土文化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中孕育产生发展起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既是对人文地理环境影响的精华汲取,也是丰富发展地域文化内涵的创新创造。莆仙文化较好地保留了“衣冠南渡”以来中原土族的文化教育传统,形成“地覆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优良民风,崇文重教,人才辈出。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有形的乡土文化留得住,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莆仙“十番八乐”作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古老新韵”“乡音心曲”,承载着浓厚的地域特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艺术风格。莆仙“十番八乐”是乡土的、民族的,也是国家的、世界的。有形的、活态的莆仙“十番八乐”,一定能为传承创新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助力赋能。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